

席勒与德意志现代化转型

——论“古今之争”中的文化现代性思想

盛百卉

【摘要】 席勒通过对英、法等国现代化转型路径的批判，提出德意志现代化转型面临的多重任务：反对封建专制、抵制异族入侵、塑造民族认同。他从历史及现实出发，提出一条“文化现代性”建构先于“社会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他的“文化现代性”思想集中体现于“古今之争”中秉持的时间观念中。在艺术史研究方法上，他用“共时类型”研究反拨“历时进步”崇拜，力图勾画出德意志同古希腊的精神联系，以恢复德意志人的文化自信，塑造文化认同及民族认同。

【关键词】 席勒 德意志现代化转型 文化现代性 “古今之争” 时间观念

【作者】 盛百卉（1978—），女，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 (2014) 03-0079-07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在19世纪德语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中与歌德一起被视作并峙的双子星。他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毕生致力于为德意志找寻现代化转型的合适路径和支撑力量。他力图探索一条“文化现代性”建构先于“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他的文化现代性思想集中体现于“古今之争”中秉持的时间观念中。

一、席勒思想生长的历史文化语境

德意志被称为“迟到的民族”，席勒所生活的18世纪，正是这个民族被裹挟进现代化进程却苦无出路的艰难转型期。直到18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的接力棒才从英、法传到德意志。此时的德意志甚至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分裂是它的主要特征。

首先是政治领域的分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名无实，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无力统一由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地组成的松散联邦。其次是文化领域的分裂，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文学层面。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早期，德语在与法语的竞争中仍处下风。德意志第一、第二等级狂热崇拜法国文化，将法语作为日常交流和文学创作的主要语言。在民族语言受到歧视、排斥的情

况下,何谈统一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文学领域也存在着分裂,不仅有宫廷文学与市民文学的对峙,更有民族文学与英法外来文学的争夺。德意志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成为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思考的核心问题。当意识到分裂是导致落后的根本原因时,他们为扭转这种状态做了长久而不懈的努力,席勒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恩格斯曾谈到:“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不了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作品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1]笔者认为,恩格斯并不是从纯文学的角度肯定席勒等人的成就,而是从民族文化建构角度点明审美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参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积极作用。席勒从来不是闭锁于书斋中的知识分子,他希冀为迟到的德意志找到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和支撑力量。这个路径和支撑力量无法照搬任何国家的现成经验,只能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去探求。

在艰难求解的过程中,席勒注意到英、法走的是一条社会现代化优先的路径。在他看来,这种路径的思想基础是主体性哲学、线性历史进步论和暴力革命论^[2],三者都存在问题。主体性哲学片面强调理性力量,轻视感性参与建构完整人性的重要作用;线性历史进步论片面强调“现代”高于“古代”,轻视前现代社会中促使共同体产生“共通感”的重要资源;暴力革命论片面强调流血战争是社会变革的有效手段,忽视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社会秩序及德性的完善。基于德意志的现实局限,席勒从莱辛、赫尔德、温克尔曼、卢梭、康德及古希腊思想中汲取资源,力图建构一条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特殊道路,这是一条“文化现代性”建构先于“社会现代化”的道路。

二、对英、法等国现代化转型路径的批判

德意志在欧洲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迟到”恰恰给席勒这样有教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客观审视英、法等国转型路径优势与局限的机会。

尽管有观点认为他具有庸人气息,坠入了远离现实的乌托邦王国,但通过对其美学、历史、戏剧、诗歌等文献的细致研读,笔者认为,席勒虽没有像歌德、洪堡那样在某个公国中身居要职,真正发挥政治作用,但他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并不低。在享年不高的一生中,他通过美学研究、历史书写、戏剧创作等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德意志现代化转型的可能路径。

席勒敏感地意识到,英、法等国的现代化转型都遗留了未曾解决的问题。1789年5月26日,他在耶拿大学做了题为《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的就职演讲,从行文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

“看一下同一块土地上不同阶段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差异有多么的巨大。同一个性别,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也同样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而且风俗习惯是何等的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我们只需考察欧洲这一小片土地,我们就会发现黑暗和光明、无政府状态和秩序、幸福和贫穷的变化是何等的迅速。泰晤士河畔得到了自由,但却为自由背下了债务!这里的阿尔卑斯山不可征服,那里的河流和沼泽不可逾越!维斯瓦河畔,纷争造成的是衰弱和凄惨,比利牛斯山脉的对面,造成衰弱和凄

[1] 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2] 汪民安提出,成熟的现代性由“二元革命”两个车轮滚动而成。“二元革命”的双重意义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前者的代表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者的代表是“法国大革命”。参见汪民安:《现代性的冲突》,《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

惨的则是宁静无事！阿姆斯特丹没有收获却幸福富庶，埃布罗河畔纯洁的天堂却贫困不幸！”^[3]

“在这里两个相隔遥远的民族被海域所分开，可以由于需要、人为努力和政治联盟而成为了邻国；在那里同饮一河水的邻居则由于不同的礼拜仪式而变得迥然有别！是什么使西班牙的势力越过大西洋直达美洲的心脏，而且不止一次地到达了特茹河和瓜蒂安那？是什么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兰得到那么多次王位，而在法国则放弃了一切，直到在一个王位上消失？”^[4]

席勒的这番话道出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困局，他的视野非常宽广，所涉及的问题有：国家内部现代化发展的悖论（英国）、国家外部异族政治扩张及侵略造成的亡国（波兰）、资产阶级蓬勃发展导致的王权式微（法国）、宗教战争引起的现代化进程阻滞（德国）。

以泰晤士河为代表的英国是席勒提出的第一个典型政治案例。英国虽在 17、18 世纪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高歌猛进，但工业化、城市化却摧毁了許多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涌向工厂，在可怕的条件劳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两面性由此体现出来：一方面，它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有效思想武器（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是经济上自由竞争的投射）；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并不能成为现代人道德重建和异化的解毒剂。

“维斯瓦河畔，纷争造成的是衰弱和凄惨”指的是波兰，这个由维斯瓦河川流而过的民族国家被席勒作为典型政治案例提出。波兰地理位置重要而复杂，第一共和国时期（15 世纪中叶——1795 年）极端的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意志得不到体现，无力抵抗周围强国的武装入侵。该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在 1772——1795 年间，它被俄、普、奥三次瓜分导致亡国，在其后长达 123 年间消失于欧洲地图之上。

席勒写下这篇就职报告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山雨欲来，距离“第三等级”^[5]的“网球场宣誓”^[6]不到 1 个月。席勒虽无法预见大革命的爆发，但他还是将法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案例提出。他观察到封建王权在资产阶级和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后的日益衰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世界史可以助力解决本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在“三十年战争”^[7]中，德意志各新教诸侯国与天主教诸侯国在政治私利的驱动下同室操戈，沦为欧洲各国政治野心的牺牲品。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严重滞后的“迟到民族”如何在强敌环伺中走上正常的现代化进程？如何不复演波兰的悲剧？这一切都令席勒忧心忡忡。

在席勒看来，德意志现代化转型面临多重任务：不仅要反对封建专制、抵制异族入侵，更要找到合适的共同体建构模式。他国的经验证明，君主立宪制或人民共和制虽已被建立起来，但“人”的现代化问题并未解决。“人”的现代化转型无法通过革命一蹴而就，它更多体现为文化领域漫长的细致建构。在此过程中，有诸多问题困扰着现代人。

比如，怎样看待既往传统？表面看来，这不过是学术领域的“古今之争”，但它背后隐含的恰恰

[3] 约翰·雷曼：《我们可怜的席勒》，刘海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8 页。

[4] 席勒：《什么是和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张玉能译，见《席勒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8 页。

[5] 第三等级，是指 18 世纪末法国政治社会中由农民、工人、军人、商人、手工业者、地主、城市贫民、资产阶级等构成的没有贵族、教士身份的法国公民。他们占总人口的 95%，但是享有的政治权力非常有限。

[6] 网球场宣誓，发生于 1789 年 6 月 20 日，法国第三等级代表成立国民会议，对他们的意图宣誓，绝不离散，直到一个新宪法颁布。

[7] 三十年战争，始于 1618 年，终于 1648 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引发的全欧范围大规模国际战争。肇始于波西米亚人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结束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该条约的签订虽然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但条约规定德意志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愈发加剧了德意志自“黄金诏书”（查理四世于 1356 年颁布的神圣罗马帝国基本法）颁布以来的政治分裂局面。

是“现代性”问题,因为现代性“导源于一种敏感的时间意识”。^[8]“崇古”或“崇今”的表象下其实是启蒙现代性所持的线性进步论与文化现代性所持的螺旋式进步论的尖锐对立。

再如,怎样看待政治变革?政治变革似乎与文艺(美)无关,但二者在古典政治学中恰恰互为表里。古典政治学强调“善的政治”,善的政治要求公民具有正义、勇敢、忠诚等美德,这种美德人无法先天具备,乃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近代以降,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开创的现代政治学将“德性”问题与政治问题拆解开来,其秉持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观念异化出“个人化”和“大众化”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工具理性”对人类“生活世界”的侵入亦造成现代人的普遍异化及精神贫困。

席勒以美学、历史研究和诗歌、戏剧创作积极参与到德意志现代化转型路径的思索中,他从德意志的历史及现实出发,提出了一条“文化现代性”建构先于“社会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也因此,他成为继卢梭、维柯、克洛卜施托克、莱辛、赫尔德、温克尔曼之后,在文化现代性思想大路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

这些秉持文化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家虽然思考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涉及如下问题:(1)对现代性时间观念的批判;(2)对永恒进步线性秩序的批判;(3)对感性能力的重视;(4)对更为正义的共同体的审美建构;(5)对现代人教育的崇尚;(6)对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的重视。这些都成为席勒文化现代性思想的重要资源。笔者认为,席勒正是从通过对“古今之争”的积极参与从而为社会层面现代化进程迟滞的德意志确立了文化上的优越性。

三、“古今之争”中的文化现代性思想

在新旧交替的启蒙时代,每个思想家都不可避免或显或隐地思考时间问题。法国、德意志思想界对于时间问题的关注更引发了文学领域的“古今之争”。笔者认为,每种时间观念的背后都有着“进步论”或“退步论”的深层背景。作为西方现代性发生以来的一个经典哲学、美学话题,“古今之争”意味着“人们意识到‘古’与‘今’的区别,也就是说‘现代’要求进行自我确证。”^[9]“古今之争”恰恰体现出思想家对于民族国家地位、民族语言及民族文化的强烈关切,是其对于国家现代化路径在文化层面的深沉思索。

“静止世界观”和“神创论”在中世纪以前一直是西方人头脑中各种意识的主导力量。韦勒克提出,“十七世纪以前,大家都认为,希腊和古罗马大致处于和法国或英国相同的水准。维吉尔和奥维德,贺拉斯,甚至还有荷马,论者在探讨的时候,几乎视为同时侪辈。时代之间存在的时间鸿沟,很少为人意识到,尽管年鉴的客观史尽人皆知。历史发展这一观念的萌芽,包孕于进步的理念,这一理念可以上溯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0]“进步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与“循环时间观”纠缠在一起的。古希腊、古罗马作为异教文化在漫长的中世纪一直处于被教会压制的状态。文艺复兴表面上看是复兴古代艺术,但其深层意图是现代要确立自身在时间序列中的优势地位。“现代”用“古代”的权威对抗教会的权威,它自身也因为模仿、复兴“古代”而获得了文化上的优越性。

尽管法国和德意志都被现代化进程裹挟,但由于地域、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差异,两国启蒙思想家对“循环论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的取舍有所差异。

[8] 沈语冰:《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9] 刘剑:《“古今之争”之争中的莱辛及其〈拉奥孔〉》,《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0]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仔细梳理法国的“古今之争”。我们发现，自然科学领域的伟大成就使法国思想家更倾向于乐观历史进步论，丰特耐尔、伏尔泰、孔多塞是此论调的典型代表。他们相信，“在时间长河的流淌中（le flux temps），人类发展了其理性，扩大了其自由，同样也强化了其超越过去的能力。”^[11]“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在艺术评价准则上也把“线性时间”当作一个重要尺度。佩罗提出：“如果现在老天爷愿意生下一个具有维吉尔般天才的人物，可以肯定的是，他将写出比《埃涅阿斯纪》更优美的诗歌，因为按照我的假定，他将拥有与维吉尔同样多的天才，同时又可以受到更多规则的指导。”^[12]他认为人类在不断进步，因为国王路易十四对艺术的保护以及文字传播方式的变革，在时间序列上后至的艺术作品不仅不逊于甚至要高于时间序列上先至的艺术作品。

较之于法国的现代性时间观念，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层面处于落后地位的德意志启蒙界对待时间的态度更加复杂，既存在一种与钟摆时间相对应的线性时间观又广泛存在一种形而上的时间观。18世纪末，康德虽然用星云学说构想了宇宙的进化，但他否认地球上生物有自然进化的过程，并且否认人类道德会随时间线性流逝趋于完善。赫尔德虽然结合康德与维柯的思想提出一种涵盖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哲学观念，但他并没有预见到较高形式是从较低形式发展而来的。德意志人对线性时间进步论持谨慎态度，他们从民族历史、传统的时间深处找寻一种文化层面的优越性。

由此可见，在时间观念上，法国理论家大多秉持“向前看”的乐观，而德意志思想家则大多具有“向后看”的文化自觉。

席勒也以众多的诗歌及《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人的美学教育书简》参与到时间问题的探讨中。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曾高度评价他“把自一个世纪来进行的关于现代和古代之关系的大讨论，那由佩罗推动的‘古今之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13]笔者认为，这个评价非常到位，因为席勒另辟蹊径，在艺术史研究方法上用“共时类型”研究有力反拨了“历时进步”崇拜。

席勒冷静审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古今之争”，他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建构文化认同的现实需求出发，提出了迥异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4—1796）中，他不以国别、时代为评价尺度，而是把从古代艺术精神中提炼出的，不会随着线性时间流逝，恒常、隐蔽的文化心理范型——“自然”——作为艺术史研究的参照系。

根据与“自然”的关系，席勒将从古至今不同地域的诗人分为两种：“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前者造就素朴的诗人，后者造就感伤的诗人。”^[14]诗人“他们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失去的自然。由此，就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作诗方法，诗的整个领域都被这两种作诗方法详细阐明和测定着。所有诗人，只要实际存在着，他们都是处在由时代决定的状态之中的，他们活跃在时代之中，或者偶然的情况对他们总的教养和一时的心境发生影响，他们就要么属于素朴的诗人，要么属于感伤的诗人”。^[15]

那么，“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二者孰优孰劣？席勒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角度很特别。他提出，“古代诗人和近代诗人——素朴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或者完全不能加以比较，或者只能在一个更高的普遍概念之下加以比较（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概念的）。事实上，如果有人首先从古代诗人的作品

[11] Baker (K.), Condorcet, raison et politique, Paris, trad., 1988, p. 455, 转引自丹尼尔·罗什：《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杨亚平、赵静利、尹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12]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35页。

[13]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卫茂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0页。

[14]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15]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第284页、第280页。

中片面地抽出一个诗的类型概念,那么把它们同近代诗比较,并且贬抑后者,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可也是最肤浅不过的了。如果有人仅仅把对单纯的自然始终产生同样作用的东西叫做诗,那就必然不会把诗人的雅号给予创造了独特而崇高之美的近代诗人们,因为他们仅仅向受艺术熏陶的文化人讲话,而对于单纯的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16]可见,席勒没有用法国“古今之争”中“崇今派”或“崇古派”一元论模式评价“素朴的诗人”或“感伤的诗人”的优劣,而是抽离出一些范式进行交叉对比。他认为“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在驾驭艺术类型、诗人同材料的关系等方面各有千秋。在前者擅长的领域,后者必然落败;而在后者擅长的领域,前者也要认输。

比如,“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中都不乏天才,但采用何种艺术类型展示天才则要受到时代的限制。“古代诗人凭借有限物的艺术而成为强有力的,而近代诗人则凭借无限物的艺术成为强有力的。”^[17]这里“有限物的艺术”指的是以叙事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史诗和雕塑艺术。“无限物的艺术”指的是以抒情为主要表现手法的诗,包括讽刺诗、哀歌诗和牧歌。如果说“自然人通过绝对地达到一种有限来获得他的价值,文化人则通过接近无限的伟大来获得他的价值”。^[18]“感伤的诗人”虽然在“有限物的艺术”中败给希腊人,但他们却在“无限物的艺术”中捍卫了自身的尊严。

同时,席勒认为“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在感受方式上虽然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高下之分,仅是由诗人同材料的关系决定的。

“素朴的诗人”因摹仿自然,所以他与对象只构成单一关系。无论采用何种艺术类型,他给予欣赏者的审美印象没有太大差异:“我们的感情是始终不变的,完全由一种要素构成,所以我们在构成要素中看不出任何差别。甚至语言的差异和时代的不同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原因和结果的这种绝对统一正是素朴的诗的特点。”^[19]“感伤的诗人”因表现内心,所以他会在“作为有限物的现实”和“作为无限物的观念”两者的混合中产生多种可能的配比关系:“他所引起的混合感情始终证实这种源泉的双重性。既然这里包含着不止一个原则,所以问题是,二者之中哪一个在诗人的感情中和他所创造的形象中占据优势,因而可能有处理的差别。”^[20]诗人可能讽刺现实,也可能塑造理想,显示出多样化的风格。

因此,“素朴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不因时间序列中的先后而有高下之分。二者的优势与局限并存。素朴诗人的优秀在于他能够再现真正美善合一的自然;感伤诗人的优秀在于他能够张开想象力的翅膀,有节制地表现心中的理想。

笔者认为,席勒在艺术史研究中摒弃历时维度、诉诸共时维度的深层原因在于:勾画出德意志同历史上伟大希腊的精神联系,恢复德意志人的文化自信,塑造文化认同及民族认同。他要向世人宣告,德意志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是“迟到的民族”,但她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德意志的艺术必将迈向辉煌的明朝,但在这个历程中,时间序列上的“过去”从来不会真正地离场,在长期的文化演进中积淀下来的心理模型、审美范式、经验视野和美感趣味将在建构德意志现代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艺术将回归“自然”,但肯定是在更高的层面上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回归“自然”。

[16]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287页。

[17]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287页。

[18]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286页。

[19]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289页。

[20] 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289页。

四、结语

席勒借艺术领域的“古今之争”参与到德意志现代化转型的思索中，他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与其建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席勒在时间上的“向后看”不是一种“倒退”，而是要通过汲取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助力德意志现代化转型。当下的中国亦走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路上，在政治、经济层面现代化转型的同时，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亦不能滞后。席勒怀着深深的“文化乡愁”，把在时间的长河中寻得的精神血脉与他所处时代的吁求熔铸为一体。因此，能否从其寓于“时间观念”中的文化现代性思想中汲取有益资源助力我国转型期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这无疑是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文化理论问题。正如曹卫东所说，文化现代性思想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构建美学乌托邦，而是“试图在教育过程中使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达到一种成熟状态(Mündigkeit)，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化”。^[21]

(责任编辑 张 灵)

[21] 曹卫东：《权力的他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reaty validity, invalidity and interpret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mandatory law.

On Legal Issues in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Package Recycling 53

Lu Shuyuan/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aw, Shangha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ecycling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To implement the two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recent focus in building a conservation-oriented society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cycling economy,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drafte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Package Recycling (draft). But some issues remain contentious in this draf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deficiencies in this draf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bject, object and content, and propose some measures for improvement by clarifying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individual business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consumers as natural person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orresponding standard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ackage recycling and unifying the name of packages as used packing materials, and enhancing responsibilit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ckage recycling laws, regulations and regulatory documents.

Analysis of Rationa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System of Equity Acquired in Good Faith 62

Wang Limei/Ph.D.candidat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ssociate professor at X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ystem of equity acquired in good faith is the new system formed by implanting the relevant rules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system. There is no consensus among scholars as to whether the implantation is rational or not. To tackle this issue, it'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three-level nature of equity so as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equity as a single civil rights of property, with a certain relationship of homogeneity with property rights, which will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applying bona fide acquisition system to equity. Meanwhile, in order to guide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system, specifically by strictly defining and scientifically explaining its application elements, including subject elements, subjective elements, action elements, and formal elements, so as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afety of equity transaction and stabilize equity trading order.

Discipline Trough: the Original Form, Distortion and Return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69

Ma Rongchun/Ph.D of law,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aw, Y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Discipline trough and theory level of criminal law research are supposed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in China. However, discipline trough has been distorted and theory level has been retired increasingly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in China. The distortion of discipline trough may result in missing desirable knowledge innovation, encouraging closed academic mentality, and being separate from the actual need of criminal law practice, so it's necessary to break away from the distorted discipline trough as the mistaken area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through gradually improving cultivating system of higher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professional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return to the discipline trough with it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goal proposed by professor Chen Xingliang, so as to prompt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jurisprudence.

Schiller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Germany: on Cultural Modernity in "Aqua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79

Sheng Baihui/Ph.D. of literature, lecture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By criticizing the approache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Schiller reveals the multiple task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faced by Germany: fighting against feudal autocracy and alien aggression, and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reality, he proposes a unique approach with cultural modernity preceding social modernity. His cultural modern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cept of time held in "aqua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about the history of art, he is in favor of the method of "synchronic type" rather than "diachronic progress". He tries to outline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ancient Greek, so as to restor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Germans and shape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History Memory in Building National Identity: with a Perspective of Tracing the Common Ancestor 86

Zhao Qiong/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racing the history memory is an indispensable dimension in building national identity. Tracing the ancestor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process. Historical narrative has an apparent characteristic of constructivism, not